

【历史研究】

# “两唐书”文苑与儒林的历史书写及其关系

陈 维

摘 要: 新旧“唐书”采取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来构建唐代的儒林和文苑,《旧唐书》偏重于强调经生和词臣在儒林、文苑中的重要性,没有严格的去区分文苑和儒林的界限。《新唐书》对唐代儒林、文苑的书写则更强调治礼儒士和诗赋之士,对于儒林、文苑的分界更加清晰有条理。这是由于到了宋代,道学的萌芽及宋初古文家对唐代古文的传承使其偏重于以本朝之风貌视前代,于是造成文儒分流的书写模式。对比两种书写模式,一方面可以看出宋代对唐代历史的重构倾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语境中,书写者对历史的想象往往会导致事实的失真。

关键词: “两唐书”; 文苑; 儒林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0751(2015) 03 - 0115 - 05

文学与儒学一直是中古时期士人思想世界中的两条路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两者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对于士人身份的认定一方面出于后世研究者所采取的立场,另一方面取自于史籍本身对士人身份的判定,正史中《儒林传》和《文苑传》(或称之为《文艺传》)就是书写者对士人认定并将其集合的一种书写模式。自秦汉到魏晋,文学的独立性逐渐加强,文学不再只是有助教化的经典之文,而成为士人的一种审美情趣,文质之间的争论也导致中古思想中文学与文化产生结构性紧张。<sup>①</sup>这直接促成了《文苑传》出现在了正统史书的列传中,并为后世所沿用。然而在唐宋以前,文儒之间并未有严格的区分,两者的界线十分模糊,儒林多指经生,但文苑中也颇多通经义或被人称为儒者的士人。到了唐宋,文学和儒学都先后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此时的列传书写往往呈现出一种总评的趋势,文儒间的隔阂也开始逐渐产生。成书于五代及宋的“两唐书”中包含着两套不同的儒林、文苑书写模式,一方面显示出书写者对于唐代文学儒林整体风貌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唐代儒学、文苑在历史阐释中出现了大的变动,从而影响到

后世对唐代文学、儒林整体景观的认识。

## 一、经礼之间“两唐书”儒林的书写及对比

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儒学传》中对于儒学之形态有这样一番见解,其序云:

古称儒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sup>②</sup>

在《旧唐书》的书写中,儒学的核心即为经学,通一经,且引经决事才是儒者教化天下的手段。一如以往《儒林传》所采取的书写模式,《旧唐书》(含附传)所载之 45 人,大都是通晓一经,举明经,出任国子监官职的经生。《旧唐书》试图将唐代的儒学风貌引到经学上去,但其又言“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故近理国多劣于前古”<sup>③</sup>。由此可见,自魏晋以后,重文轻儒的现象出现,士人不纯用经学治国,参以文学、法家等多样手段。儒道已衰,士人对待儒学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纯粹。儒者在自身认定上,也并不以解经者作为标准,

收稿日期: 2014 - 12 - 12

作者简介: 陈维,男,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天津 300071)。

这在《旧唐书·儒学传》中也有所体现。如李善“尝注解文选”<sup>④</sup>。《文选》并不能算是经学的一种,李善却以注解《文选》知名被选入《儒学传》而不是《文苑传》中。《新唐书》将李善从《儒学传》剔除,论者多以为《旧唐书》选取不当,不若《新唐书》之精要。然《旧唐书》所选曹宪、许演、公孙罗诸人入《儒学传》之理由皆与《文选》有关,不可看为李善个人的误记。如曹宪“精诸家文字之书”,多为音训引证,其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可见,曹宪的入选是因其文字、音韵学上的造诣,许淹和公孙罗也由此入选。而李善的入选并不止在其音义上的造诣,还在其诸文引证中对儒学经典的大量使用,其博于征引而略于音训,使得其在文学通用程度上不及五臣注《文选》,而流行于文儒并用的学者之中。<sup>⑤</sup>同入儒林的刘伯庄则是以注《史记》《汉书》闻名,秦景通以精《汉书》为显,路敬淳以明谱系、善于究根溯源入选,柳冲亦由明世族入选。<sup>⑥</sup>

《旧唐书》对儒学士人的选取标准大体在史学、经学、谱学三个方面,而在选取断限上,多选取玄宗朝之前的,中晚唐则很少,在选取的中晚唐诸儒中,如许岱,因其多涉诸子;苏弁,少有文学;许康佐,登宏词科。除了新春秋学派的陆质、著《三传异同》的冯伉外,都跟文学相关,且不再经由明经入仕。这一方面跟中晚唐明经科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晚唐儒学定义的模糊化,除陆质、啖助等新春秋学派外,大都转向了非经学化的儒学路数,而在此间文学(不单指辞章诗赋且指各种表章诏令的书写)成为儒士间互相认定的身份标准。文儒之间的界限显得十分模糊,这在元和年间最为显名的几位儒士如韩愈、柳宗元身上也体现出来。尽管《旧唐书》试图将儒学重新书写成经生的流变史,但在选取和书写中已经无法改变中唐以后儒文并举的现象。

相比之下,《新唐书》的书写要整齐划一得多。《新唐书·儒学传》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大幅增加了一些经学之士,将《旧唐书》单独立传的孔颖达划归到儒学中,盛谈唐初经典修订之事,同时增加了礼学之士在《儒学传》中的比重。其所选定的中晚唐儒士,如韦彤乃为中晚唐治礼之名家,著有《五礼精要》,陈京曾参与中晚唐著名的禘祫之争等。在《新唐书》的书写中,礼学为叙述的重点,其所选 68 人中,通经者、通诸子、通史、通书法、谱学者事迹颇从简,而大幅增加了治礼者有关礼仪的各种言谈。据

此可窥测,《新唐书》认为唐代儒林的核心议题和核心成就均保存在礼学的评议中,礼为儒学之本。这与北宋初年儒风盛行和士人对儒学的体认有关,宋真宗言“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浸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并举,儒术化成。”<sup>⑦</sup>北宋初年大批士子以振兴儒学为己任,朝野上下也大力尊崇扶植儒学,作为维护儒家伦理秩序的礼对于国家的象征意义就更为重要。《新唐书·礼乐志》就曾对三代以后礼乐的衰败叹息云“由三代以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自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sup>⑧</sup>正是因为对礼乐为虚名的忧患意识,宋祁等人对唐代熟悉礼法、详于治礼之人多了一份认同,将其视为唐代儒林的“主流”,另一方面,大历以来的礼学名家对宋代的礼仪世界影响极深,韦彤的《五礼精要》成为北宋礼仪机构案头必备之书,对于北宋礼制的建立和运行都起了极大作用,这也恐怕是《新唐书》在儒林的书写中尤重礼学名士的另一层原因。<sup>⑨</sup>

《新唐书》在构建礼学世界的同时对大历以来流行于时的种种学术进行了批判,其言“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句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苞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句、子陵最卓异”<sup>⑩</sup>。学者往往引此文做中唐以后学术变革说,认为其为中唐学风之大变,摆脱旧说,直探经文,改变了过去寻章摘句的注经方法。啖、赵诸人敢于挑战官方经学,热心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为宋以后学术之变注入新活力。<sup>⑪</sup>然宋祁等人在《新唐书》中并未将大历以来新说做时代突破之举,其引唐文宗评施士句言“朕见之(士句《春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得邪矣。”<sup>⑫</sup>其评新春秋诸儒之言则更甚“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述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sup>⑬</sup>施士句和新春秋学派诸儒都为春秋注解,且所注经义多不与前人合,好为标新立异之文,至少在中唐时期只能视为一种时风并不能视为学术的主流,前引文宗言可见一斑。而在宋、欧诸公看来,新春秋学派对于经义的解读则是全凭己意的,对于三家注毫不承继,完全是靠自己的意思来推断孔子之意。对于这些新异的学说,《新唐书》并不十分推崇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然

而北宋中期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道学的兴起使道学家在选取前人成果时,往往爱好那些自抒胸臆的义理阐释而非经义的训诂,这使他们对啖、赵、陆诸人多了一份支持。如《二程集》言“昔者孔子伤时王之无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贬恶,为后王发也,自去圣既远,诸儒异论,圣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陆淳学于啖、赵,号为达者,其存书有《纂例》、《微旨》、《义统》,今之学者莫不观焉。”<sup>⑭</sup>同时,刘敞对《春秋》的注解也继承了中唐以来的新春秋学派,新春秋学派影响涉及了其后的整个经学史,重为义说的宋学即由其发端。<sup>⑮</sup>宋学的兴起抬高了新春秋学派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改变了以往的书写模式,使整个评价体系发生了改变,而北宋初期成书的《新唐书》采取的书写形式并不像其后道学那样,也不像《旧唐书》那样模糊文儒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新唐书·儒学传》试图书写的是一种北宋建国初期士人期待的儒者形象——他们有气节,有一定的家学渊源,精于礼学,试图将政治回归到一个礼仪规范的世界中。

## 二、何谓斯文 “两唐书”《文苑传》的对比研究

“两唐书”在《文苑传》的书写上则更加不同,这种不同来源于对“文”的理解上的不同。傅汉思就曾对《旧唐书·文苑传》的文士做过定型分析,认为其是按照固定的书写模式来书写文士们的。<sup>⑯</sup>田恩铭的博士论文也探讨了“两唐书”《文苑传》所选文士之资格、意图及唐宋变革间文学观念的变化<sup>⑰</sup>。那么“两唐书”对于文的理解究竟有何不同呢?

《旧唐书·文苑传》就有唐一代文学做论:

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sup>⑱</sup>

《文苑传》序秉持一种文质交替的文学观念,对前代尚“质”而宗训论鄙雕虫的“是古非今”观念进行了批判。其所持的文学评议建立在沈约的“斟酌《二南》,剖陈三变”,重音律的基础上,认为代有风骚,不独只是曹植、谢灵运独占汉魏以来文学鳌头。<sup>⑲</sup>自魏晋以来独立的文学理念愈来愈盛行,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形式,是否应该具有自己的艺术审美,而不去在意经典文本、儒学教化对文学本身

的束缚这种思考一直萦绕于魏晋士人的头脑中,此间对文章独立于教化的批评也时有论及。<sup>⑳</sup>然而在唐代,这种文、儒间的对立并非那么强烈,相反,儒士之间交游及向座主行卷等往往依托于文学,在《旧唐书》的书写中,唐代文学景象是多元的,初唐有横汾之诗,也有柏梁之奏。燕、许、吴、陆、元、刘、王、杜等诸文士共享天机秀绝之名。《旧唐书》所举唐代文苑之魁首及评议标准与当代文学史颇不类同,张说、苏颋、吴通玄、陆贽、刘蕡都算不上当代所谓一流文学家,何以《旧唐书》将其列为唐代文学之风尚呢?其一为列传不列爵位崇高者,如韩柳诸人别为之传;其二,张、苏、吴、陆、元、刘诸人所借非为诗歌辞赋而为“王言”“对策”,《文苑传》中涉及中唐以后文士多以其善奏对、诏策入选。唐代“文”不单指词章歌赋,如制诰、表颂、谥册等诸多朝堂公文都可以视为“文”之范畴,善于公文者皆可视作善属文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及入翰林院者多为唐代文士中文坛巨匠,也为文士中的最优期望。<sup>㉑</sup>如许景先,“俄转中书舍人。自开元初,景先与中书舍人齐澣、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sup>㉒</sup>。又如席豫,“三迁中书舍人,与韩休、许景先、徐安贞、孙逖相次掌制诰”<sup>㉓</sup>。齐澣、徐安贞、孙逖都有传于文苑内,皆因善书制诰得选。

中书舍人在正五品上,其常直禁垣,代为王言,为文士希冀之良选。安史之乱后,知制诰多入翰林,由郎中等官所兼,两年后为真中书舍人,如吴通玄“贞元初,召充翰林学士。迁起居舍人、知制诰,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等同视草”<sup>㉔</sup>。又如王仲舒“元和五年,自职方郎中知制诰。仲舒文思温雅,制诰所出,人皆传写。”<sup>㉕</sup>官拜中书舍人知制诰的文士,其“文”之修养已被朝廷所认可,被作为一种示范性的“文”传达而下,为广大士人争相传写。依靠代为王言,“文”具有官方性和象征性,代表着权力统摄下“文”应有的面貌和框架,从而引导文士积极地向这种风尚转变,在《旧唐书》的书写中,这种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文”,被视为一种文苑标志所彰显。

《新唐书》对唐代文苑的分析与《旧唐书》迥异,其言: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

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擢擢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牾晋魏,上轶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sup>②6</sup>

《新唐书》很明显地反对以往浮靡华丽的文学风气,将唐代的文苑进程描绘为文学趋于雄浑朴实的发展史。从玄宗起,即“崇雅黜浮”,到大历、贞元年间,唐文学达到顶峰,由韩、柳、李等人“擢擢道真”,推崇古文,排逐百家,使唐代文学超过了汉魏。

在《新唐书·文艺传》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艺术审美的文体出现,很清晰地勾勒出唐代文学的脉络,将其视为一种不断革新而日趋精妙雄厚的图式。<sup>②7</sup>在这种分析模式中,萧、李、韩、柳以来的古文传统被作为唐“文”之典范,因韩愈“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杨雄为未淳,宁不信然”。<sup>②8</sup>文与道合,以文显道,是《新唐书》对“文”的理解,也是宋初古文家对古文推行之意旨,其余以文翰为生,叹咏诗歌的文士只能是儒士的“一艺”,“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朽”。<sup>②9</sup>如果科举不试,也能乐得悠闲,不怨望朝堂,劝君行善。

在《旧唐书》中被列入文苑的许多士人,在《新唐书》中归为了儒林,如徐齐聃、徐安贞等,还有不少被归入列传中,如“许景先、齐澣、席豫、吴通玄等”<sup>③0</sup>。这些士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曾为草诰之臣,在《新唐书》选取标准中,那些以草诰、奏表为显的词臣被剔除出去,而加入了许多以诗文显名的士子。《新唐书》对徐齐聃列入儒林的理由是曾议过家庙之礼,赠礼部尚书;徐安贞因与褚无量、卢僎、陆去泰等讎定旧籍,列入儒林,其以文显名的事迹被忽略。这是由于《新唐书》碍于时代所限,对唐代文之理解已经不再能深入到唐代具体的语境中去,而采取一种“文学史”式的提萃法,即选取符合其文学观的唐代文学诸士子,以标志性精英人物作为此时代文学的典范和标准。入列传的文士大都是在当时显名一时的诗赋之士,虽不登宰辅,但大多数都有官职,而唐代更多的是努力跻身仕途的普通文士,他们的声名不如这些入列史籍的文士那么显赫,对他们来说,文是谋取政治地位和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策论和文诰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身处中书、翰林词臣对其影响要大于后世普遍认定的文

学家们,例如在元和年间,天下的文宗为权德舆,元稹自言“元和以来,贞元而下,阁下主文之盟,余二十年矣。”<sup>③1</sup>在其掌贡举的三年中,元和诸文学名家皆由其门入,可见这些身处台阁的词臣对当时的文坛何等的重要。

《旧唐书》在选取上尚能贴近唐代一般文士的语境,显出这些词臣在文坛中的重要性。而在《新唐书》中,这种语境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诗歌之士,一是由于宋去唐已有百年,对前朝理解难免有所纰漏。二则唐宋以来文风已变,宋学之文风承韩柳之古文,发道学之深义,以宋风视唐风,使得《新唐书》在描写唐代文苑时未免多出自我构建。《新唐书·文艺传》中还增加了大量的古文家文士的列传篇幅,如萧颖士、李华等,盛言古文之兴。《新唐书》裁汰骈文,多用韩柳文是一个普遍现象,赵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其言“欧苏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必尽删之。”“其他骈体有新语不忍弃者,则宁代为改消存之。”<sup>③2</sup>而遇到韩柳古文可入史者,必採摭不遗。萧、李等与韩柳古文师承相关的诸人,也由于宋祁等北宋古文家对古文的推崇而获得较高的评价。<sup>③3</sup>

### 三、结论

对比“两唐书”中儒林、文苑传,可以看出两书对唐文儒的书写模式不同。《旧唐书》所依照的是经学化和公文化的文儒模式,其对于文苑、儒林之间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显,一些兼具文词经学的士人,《旧唐书》无法清晰地定位其身份归属,一些出现在《文苑传》中的文士,都曾经少好儒学,或被称之为儒士。这在唐以前的正史文本中都十分常见,这是由于尽管独立的文学观出现,但士人无法分别对待文学和儒学,儒学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所有的知识都要围绕其进行诠释,文学在独特艺术审美之外,依然要保持对儒学教化的向往。如王勃言“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为志。”“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sup>③4</sup>过分关注于辞赋是使“斯文”毁坏的缘由。同时,唐中叶以后,“文”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模式<sup>③5</sup>,这时候文不单纯是作为儒学层面上发扬政教的论说,而成为一种政治技艺,即掌握“文”的词臣支配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他们以家

族为中心以文学声威为依托在科举中不断地获得成功,并长期垄断词臣职位。<sup>③</sup>这里就出现了作为政治公文的文章及作为文章词赋的文两种形式,而《旧唐书》将这两种形式杂糅在了一起,于是造成《文苑传》中玄宗以前专书文艺之士,玄宗之后多取词臣的书写形式。而在《新唐书》中这种混乱的书写模式已经被统统推翻,儒林和文苑的分界线逐渐明显起来,儒林是指精通礼学、经学、谱学的专门之士,而文学则是以文章词赋见长的文士,两者皆有者入列传而不入文苑、儒林。这一方面是由于韩柳之后,使得文章与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到宋代发展到了极端,独立的文学观被排斥出文章之外,就连主张文道合一的韩愈也被朱熹认为过于沉溺于文学技艺而荒于探究道之真理,其言“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寻文章,至于经纶实务,不曾穷心。”<sup>⑤</sup>儒学中一部分已经转化成了道学,文儒逐渐开始分流。同时也由于在北宋出现了“周程欧苏”之裂,道学家与古文家产生了分歧,刘垹就曾说“文章乃道家之所弃。”<sup>⑥</sup>中唐韩愈推崇的以文入道的方式已经不能弥合道学和文学的裂痕,文儒这个在唐代还具有特色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于宋代,那些词臣家族也逐渐由于新科举制的排挤及道学者们的攻击而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新唐书》中的《儒林》《文艺传》中对词臣的裁汰,已经能隐约看到这一点。“两唐书”的不同书写反映了两个朝代对唐代文苑儒林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了不同朝代知识体系对史书书写的影响。

2009年,第7、15页。②③④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㐀㐁㐂㐃㐄㐅㐆㐇㐈㐉㐊㐋㐌㐍㐎㐏㐐㐑㐒㐓㐔㐕㐖㐗㐘㐙㐚㐛㐜㐝㐞㐟㐠㐡㐢㐣㐤㐥㐦㐧㐨㐩㐪㐫㐬㐭㐮㐯㐰㐱㐲㐳㐴㐵㐶㐷㐸㐹㐺㐻㐼㐽㐾㐿㑀㑁㑂㑃㑄㑅㑆㑇㑈㑉㑊㑋㑌㑍㑎㑏㑐㑑㑒㑓㑔㑕㑖㑗㑘㑙㑚㑛㑜㑝㑞㑟㑠㑡㑢㑣㑤㑥㑦㑧㑨㑩㑪㑫㑬㑭㑮㑯㑰㑱㑲㑳㑴㑵㑶㑷㑸㑹㑺㑻㑼㑽㑾㑿㒀㒁㒂㒃㒄㒅㒆㒇㒈㒉㒊㒋㒌㒍㒎㒏㒐㒑㒒㒓㒔㒕㒖㒗㒘㒙㒚㒛㒜㒝㒞㒟㒠㒡㒢㒣㒤㒥㒦㒧㒨㒩㒪㒫㒬㒭㒮㒯㒰㒱㒲㒳㒴㒵㒶㒷㒸㒹㒺㒻㒼㒽㒾㒿㓀㓁㓂㓃㓄㓅㓆㓇㓈㓉㓊㓋㓌㓍㓎㓏㓐㓑㓒㓓㓔㓕㓖㓗㓘㓙㓚㓛㓜㓝㓞㓟㓠㓡㓢㓣㓤㓥㓦㓧㓨㓩㓪㓫㓬㓭㓮㓯㓰㓱㓲㓳㓴㓵㓶㓷㓸㓹㓺㓻㓼㓽㓾㓿㔀㔁㔂㔃㔄㔅㔆㔇㔈㔉㔊㔋㔌㔍㔎㔏㔐㔑㔒㔓㔔㔕㔖㔗㔘㔙㔚㔛㔜㔝㔞㔟㔠㔡㔢㔣㔤㔥㔦㔧㔨㔩㔪㔫㔬㔭㔮㔯㔰㔱㔲㔳㔴㔵㔶㔷㔸㔹㔺㔻㔼㔽㔾㔿㕀㕁㕂㕃㕄㕅㕆㕇㕈㕉㕊㕋㕌㕍㕎㕏㕐㕑㕒㕓㕔㕕㕖㕗㕘㕙㕚㕛㕜㕝㕞㕟㕠㕡㕢㕣㕤㕥㕦㕧㕨㕩㕪㕫㕬㕭㕮㕯㕰㕱㕲㕳㕴㕵㕶㕷㕸㕹㕺㕻㕼㕽㕾㕿㖀㖁㖂㖃㖄㖅㖆㖇㖈㖉㖊㖋㖌㖍㖎㖏㖐㖑㖒㖓㖔㖕㖖㖗㖘㖙㖚㖛㖜㖝㖞㖟㖠㖡㖢㖣㖤㖥㖦㖧㖨㖩㖪㖫㖬㖭㖮㖯㖰㖱㖲㖳㖴㖵㖶㖷㖸㖹㖺㖻㖼㖽㖾㖿㗀㗁㗂㗃㗄㗅㗆㗇㗈㗉㗊㗋㗌㗍㗎㗏㗐㗑㗒㗓㗔㗕㗖㗗㗘㗙㗚㗛㗜㗝㗞㗟㗠㗡㗢㗣㗤㗥㗦㗧㗨㗩㗪㗫㗬㗭㗮㗯㗰㗱㗲㗳㗴㗵㗶㗷㗸㗹㗺㗻㗼㗽㗾㗿㘀㘁㘂㘃㘄㘅㘆㘇㘈㘉㘊㘋㘌㘍㘎㘏㘐㘑㘒㘓㘔㘕㘖㘗㘘㘙㘚㘛㘜㘝㘞㘟㘠㘡㘢㘣㘤㘥㘦㘧㘨㘩㘪㘫㘬㘭㘮㘯㘰㘱㘲㘳㘴㘵㘶㘷㘸㘹㘺㘻㘼㘽㘾㘿㙀㙁㙂㙃㙄㙅㙆㙇㙈㙉㙊㙋㙌㙍㙎㙏㙐㙑㙒㙓㙔㙕㙖㙗㙘㙙㙚㙛㙜㙝㙞㙟㙠㙡㙢㙣㙤㙥㙦㙧㙨㙩㙪㙫㙬㙭㙮㙯㙰㙱㙲㙳㙴㙵㙶㙷㙸㙹㙺㙻㙼㙽㙾㙿㚀㚁㚂㚃㚄㚅㚆㚇㚈㚉㚊㚋㚌㚍㚎㚏㚐㚑㚒㚓㚔㚕㚖㚗㚘㚙㚚㚛㚜㚝㚞㚟㚠㚡㚢㚣㚤㚥㚦㚧㚨㚩㚪㚫㚬㚭㚮㚯㚰㚱㚲㚳㚴㚵㚶㚷㚸㚹㚺㚻㚼㚽㚾㚿㜀㜁㜂㜃㜄㜅㜆㜇㜈㜉㜊㜋㜌㜍㜎㜏㜐㜑㜒㜓㜔㜕㜖㜗㜘㜙㜚㜛㜜㜝㜞㜟㜠㜡㜢㜣㜤㜥㜦㜧㜨㜩㜪㜫㜬㜭㜮㜯㜰㜱㜲㜳㜴㜵㜶㜷㜸㜹㜺㜻㜼㜽㜾㜿㝀㝁㝂㝃㝄㝅㝆㝇㝈㝉㝊㝋㝌㝍㝎㝏㝐㝑㝒㝓㝔㝕㝖㝗㝘㝙㝚㝛㝜㝝㝞㝟㝠㝡㝢㝣㝤㝥㝦㝧㝨㝩㝪㝫㝬㝭㝮㝯㝰㝱㝲㝳㝴㝵㝶㝷㝸㝹㝺㝻㝼㝽㝾㝿㞀㞁㞂㞃㞄㞅㞆㞇㞈㞉㞊㞋㞌㞍㞎㞏㞐㞑㞒㞓㞔㞕㞖㞗㞘㞙㞚㞛㞜㞝㞞㞟㞠㞡㞢㞣㞤㞥㞦㞧㞨㞩㞪㞫㞬㞭㞮㞯㞰㞱㞲㞳㞴㞵㞶㞷㞸㞹㞺㞻㞼㞽㞾㞿㟀㟁㟂㟃㟄㟅㟆㟇㟈㟉㟊㟋㟌㟍㟎㟏㟐㟑㟒㟓㟔㟕㟖㟗㟘㟙㟚㟛㟜㟝㟞㟟㟠㟡㟢㟣㟤㟥㟦㟧㟨㟩㟪㟫㟬㟭㟮㟯㟰㟱㟲㟳㟴㟵㟶㟷㟸㟹㟺㟻㟼㟽㟾㟿㠀㠁㠂㠃㠄㠅㠆㠇㠈㠉㠊㠋㠌㠍㠎㠏㠐㠑㠒㠓㠔㠕㠖㠗㠘㠙㠚㠛㠜㠝㠞㠟㠠㠡㠢㠣㠤㠥㠦㠧㠨㠩㠪㠫㠬㠭㠮㠯㠰㠱㠲㠳㠴㠵㠶㠷㠸㠹㠺㠻㠼㠽㠾㠿㡀㡁㡂㡃㡄㡅㡆㡇㡈㡉㡊㡋㡌㡍㡎㡏㡐㡑㡒㡓㡔㡕㡖㡗㡘㡙㡚㡛㡜㡝㡞㡟㡠㡡㡢㡣㡤㡥㡦

责任编辑:何 参

### 注释

①②③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